

《新青年》杂志上的“辛亥革命”

水 羽 信 男

一、问题之所在

“辛亥革命”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中国的现代化开启了道路。但是对于“辛亥革命”，不能提出是“孙文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以武力打倒了清朝的革命”这一结论(*1)。它并没有带来中国的结构性变革，所以不能说它是社会科学学术用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

在“辛亥革命”之后四年，开始了新文化运动。领导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的“第二代”（主要生于1880~1895年）知识分子。其特征，被认为是“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学堂中得到的教育，后来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欧美留学，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3)。

虽说如此，但也有必要注意：他们的思想是形成于自二十世纪初年开始的“辛亥革命”期。例如在《新青年》的“四大笔”之中，陈独秀（1879~1942）、钱玄同（1887~1939）、刘半农（1891~1934）等三人，都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1891~1962），也曾对“辛亥革命”作过他独特的探讨，而这对于其思想之形成，具有一定的意义(*4)。

下面，在学习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以《新青年》为主要史料，针对以下两点，就五四运动开始前的情况，进行初步讨论。

1. 推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对于“辛亥革命”及建国初期的中华民国，是怎样作出思想性总结的？

2. 将这种总结放在中国近代思潮史的展开中, 预以定位之时, “辛亥革命” = 中华民国的成立, 具有何种历史性意义?

二、“辛亥革命”与《新青年》

“辛亥革命”后, 共和思想和立宪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推广。但是, 针对这一动向, 康有为、严复等出来强调儒学的价值观, 引发了思想上的反动。比如陈焕章(1881~1933)对于“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现实, 有如下感叹:

夫中国之所以革命者, 岂不以改良政治之故耶。然而革命后之政治, 其腐败及从古所未见。……现在之政局, 果何局耶。以国内言之, 则造谣之局也, 诟詈之局也, 斗殴之局也, 棍骗之局也, 贿赂之局也, 暴乱之局也, 暗杀之局也, 分裂之局也(*5)。

这种认识并不只是鼓吹以孔教为国教的陈焕章才有。同陈焕章等人相对立、对儒学展开批判的陈独秀也共有之。1916年, 陈独秀在批判中国政治文化的腐败时提出:

外人之讥评吾族, 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 曰“好利无耻”, 曰“老大病夫”, 曰“不洁如豕”, 曰“游民乞丐国”, 曰“贿赂为华人通病”, 曰“官吏国”, 曰“豚尾客”, 曰“拜金崇拜”, 曰“工于诈伪”, 曰“服权力不服公理”, 曰“放从卑劣”, 凡此种种, 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 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6)。

而且, 陈独秀于1914年指出: 十年前的“民党”是“有道德, 有诚意, 有牺牲精神, 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的, 暗示了他对“辛亥革命”后的同盟会派所持的批判性立场(*7)。1916年, 他又指出: “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 其结果也, 不过党派之胜败”, “辛亥革命”也是“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的东西(*8)。他还进一步评之为“华人革命乃滑稽剧”(*9)。

高一涵指出: “单换一块共和国招聘, 而店中所买的, 还是那些皇帝‘御

用’的旧货，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10)。他原来强调，有必要认识“**Revolution**”和“易姓革命”的区别；认为应把是不是进行了“政治根本”的变革，作为辨别是不是“**Revolution**”的关键(*11)。如果将这种议论推而广之，那么，大概可以说，在当时主张革新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一部分人却没有把“辛亥革命”看成“**Revolution**”。至少，高一涵所说“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行制度革命而不行思想革命的坏处”等批判性论点，暗示着“辛亥革命”并不是有关“政治根本”的变革(*12)。

由是，对《新青年》同人来说，所谓“辛亥革命”，不过是在清末推行过新政的“洋人的朝廷”所改换了的招聘而已。例如陶履恭指出：“前清的官僚”之统治，到民国也延续着。他批判道：名流、“民党”、留学生，虽具有近代的知识，却不能克服“四千年专制观念的遗传”，而追随着“前清的官僚”(*13)。

在陈独秀对“辛亥革命”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且在由于为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革命而建立统一战线的需要才变得肯定评价这一变革运动之前，《新青年》的成员们一贯低调地评价“辛亥革命”。即使到了1920年11月1日，陈独秀仍在说：“中国共和政治所以如此流产……除追怀先烈以外，这国庆纪念日已没有可以令人狂信底价值了”(*14)。

以上对于“辛亥革命”的极低评价，如果其前提为这一变革不过是意味着在清末的统治层内部进行的权力转移，那么正是打中了要害。

“辛亥革命”不得不要受到如此低的评价，其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新青年》同人所举出的领导“辛亥革命”的学者、政治家——“士”的素质。即他们所严厉批判的：“士”在“革命”中和民国初期的政局中所表现出的对于权力的执意追求。例如，陈独秀曾担任过秘书长而支持过的安徽省都督孙毓筠，其后参加了复辟帝制运动，但袁世凯死后却复称“袁逆”。对比，陈独秀谴责为“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15)。

他们认为，革新派知识分子所揭示的立宪·共和的理念，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并没能实现，其重要原因，在于专求升官发财的“士”的意识形态；

于是他们对之进行了伦理性、道德性的严厉批判(*16)。但是,《新青年》同人打破现状的努力,众所周知,是在严厉谴责“土”之上,进而朝着强调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必要性这一方向前进。例如陈独秀就认为:“今其国之危亡也,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17)。

那么,怎样做才能改造“国民性”呢?也就是说,为了打破“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怎样做才好呢?民众“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这可能消除吗?这些课题,是由《新青年》同人提出来的(*18)。陈独秀坚决主张选择“共和民政之乱”作为改造“国民性”的方策。这起因于“盖以共和民政为自动的自治的政制,导吾人于主人地位,于能力伸展之途,由乱而治者也”的认识(*19)。也就是说,陈独秀把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政治性、社会性混乱中,实现“民主共和国”的理念——亦即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革新派知识分子的理念,当作了自己的课题。

话虽如此,但《新青年》同人只要追求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就必须加以研讨对于构成该理念的民主和共和之关系。这是因为,君主制和共和制作为政治制度的概念,只是显示出统治形态的差导,但这些形态并不直接体现出国家理念的本质(*20)。即所谓“政治制度之革命,国人已明知而实行之矣”——将满洲贵族从权力中枢驱逐出去而建立了共和国,但却是以“往歳之革命为形式”(*21),自清末以来并没有本质的变化。

进而言之,由于“辛亥革命”产生的政体变化,“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是不反对共和”,从而使这一课题增加了其严重性(*22)。中华民国期的革新派知识分子,直接面对着如何使民主主义在共和国中确定下来这一课题。由是,他们和她们认识到,培养出使民主主义得以在中国扎根的主体——“国民”并进行国民统合,这比起基于共和制的国家统合来,更为重要。

《新青年》同人所着眼的方策,就是“政治精神与教育主义之革命”(*23)。他们的目标,是重视大众传媒的舆论形成力和教育,凭之而获得“智”,从而培养出“国民”,进而实行国民统合。

关于此点,笔者认为应预注意的事,是陈独秀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以往

中国的“国民”的爱国心所表示的批判性立场：

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24)。

这种立场在中国思潮史中，大概可以说是凭借能使民族主义相对化的理性，而真正形成自律性民主主义思想的第一步(*25)。

三、“辛亥革命”对于《新青年》同人之思想意义

笔者指出，五四运动开始前的新文化运动，其所产生的成果，一是为培养出“国民”而进行了严肃的探索；二是民族主义的相对化。这些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笔者认为，这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是由于《新青年》同人密切注视着中华民国的现实所呈现出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状态而带来的。即由于《新青年》同人没有过高地评价孙中山和同盟会，而是正视“辛亥革命”不是可以呼做“**Revolution**”的现实，因而得以发现了打破中华民国现状的方策。这是“辛亥革命”在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中所实现的第一个思想意义。

同时，他们和她们的为培养出“国民”而进行的努力，是在经过“辛亥革命”而“从整个情况看，列强瓜分、亡国在即的形势已不那么明显”的状态下进行的，对此，有必要再预确认。因为第一代知识分子受压倒性的对外危机感所制约，“并没有把这些平等、自由作为民主的内容来认识”，与之相对，“辛亥革命”以后的第二代知识分子把“平等、自由”作为民主的基本的内容来定位，则成了可能(*26)。

在中国，要确定“个人的尊严”等民主主义的理念，国际环境之安定，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于是，“辛亥革命”对于新文化运动有过的第二个意义，就是使《新青年》同人得出一个认识：清末以来的“瓜分危机”暂时可以避免。

确实，笔者并不否认，对当时的中华民国来讲，在国际性的“国民国家”

(Nation State) 系统中, 要保持主权, 废弃不平等条约体制等民族性的课题毕竟是很重要。不过,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 虽有曲折, 但在日本直接军事侵略真正来到之前, 中国当时最大的课题, 则在于国内的民主性变革。

在这意义上, 《新青年》同人没有过度地倾斜于民族主义, 而以培养出民主主义的承担者的“国民”, 作为其目标, 是与时代环境相一致的。

以上, 笔者叙述了自己的看法之一端。如果说一个完善的民主主义社会不能一举全面地建立起来, 那么, 在对于自清末以来延续到今日的民主主义思想之后继性展开, 进行历史学的分析中, 发现“有用的过去”, 大概也是重要的。当然, 笔者虽未充分回答这一课题, 却企盼直言不讳的批判。

注

(1) 佐藤慎一 [1996] 166页。

但是, 如果将研究的优先权作为问题的话, 那么横山英自1960年代前半期起, 就已经对于把“辛亥革命”看成是“孙文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以武力打倒了清朝的革命”这一“正统史观”, 进行了严厉批判, 并且高度评价了立宪派在当时政治变动中的作用(参看参考文献)。又, 今日所通用着的“中国同盟会”这一取代了以前用过的“中国革命同盟会”的称呼, 也一定是以横山英 [1982] 对于使用前者的正当性之实证来作为论据的。尽管如此, 佐藤完全没有言及横山英的业绩。

(2) 参看横山英 [1971]。

(3) 许纪霖 [1999] 3页。

(4) 参看藤井省三 [1994]。

(5) 陈焕章:《论废弃孔教与政局之关系》,《民国经世文编(交通·宗教·道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98, 文海出版社, 台北, 1970年) 5102页。陈焕章是广东省高要县人, 康有为的弟子。1904年中进士。1911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孔门理财学》)。归国之后, 他作为孔教会的领导者, 对新闻界有过很大影响(山田辰雄编《近代中国人名辞典》霞山界, 东京, 1995年)。

(6)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2卷2号, 1916年10月1日, 1页。

(7) 陈独秀:《双秤记叙一》,《甲寅》1卷4号, 1914年11月10日, 1页。

(8) 陈独秀:《一九一六》,《青年杂志》1卷5号, 1916年正月, 4页。

(9) 前揭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 5页。

(10) 高一涵:《非「君师主义」》,《新青年》5卷6号, 1918年12月15日, 551页。

- (11) 高一涵：《读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青年杂志》1卷4号，1915年12月15日，2页等。高一涵又指出：是和平的还是伴随着武装斗争的？这并不能成为判断是不是革命的标准。
- (12) 前揭高一涵：《非「君师主义」》，551，550页。
- (13) 陶履恭（陶孟和）：《我们政治的生命》，《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559页等。在这一评论中，陶履恭还认定共和以来的七年劣于清朝末期。
- (14) 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8卷3号，1920年11月1日，2—3页。
- (15) 前揭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5页。

(16) 金观涛等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运思特征，在于追求应有的规范这一伦理主义、道德主义的倾向性很强。这种道德主义的倾向，阻碍了中华民国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将“民主”同人权或议会制联系起来去理解，而导致他们将其所认为的应有的政治性强加于人。其结果是阻碍了自由在中国的发展（金观涛·刘青峰 [1999b]）。

民国初期知识分子的这种文化心态、道德模式，虽然在吸收着西洋思想，但根本上却有着力图保存儒学的倾向，这象征性地显示了“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的不少特点”的第二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许纪霖 [1999] 3页）。虽说如此，围绕中国知识分子进行这种大议论的同时，为理解当时的思潮，对于有关中国的人权、自由等思想情况，有必要具体地研究其发展的局面。

- (17) 前揭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2页。
- (18)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1日，1页。
- (19) 独秀：《通信》，《新青年》2卷4号，1916年12月1日，6—7页。

关于此点，野村浩一指出：这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最尖锐地抓住了，并且以最明确的形式使之定型化了的课题”；康有为也同样，认为“辛亥革命”后“天下”的世界的解体，同时又意味着该世界深部深处的“文明”的解体”。这一“政治世界中的‘天下’之解体，正是这样的‘文明’解体之结果，而决不是原因”。就是说，在野村看来，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以中华文明崩溃的强烈现实感为前提，而展开其运思的（野村浩一 [1990] 19~20页）。

但是，笔者未能充分理解野村的见解。陈独秀会有和康有为同样的文明崩溃感吗？此处为避免详细地议论这个问题，只想指出一点，即野村在理解当时的思想情况之上，作为其主要依据的康有为之言说，将中华民国时期的现实称之为“‘文明’的解体”而对之评价极低，乃是为了宣传复古的意识形态而使用的修饰性说法。康有为过度地美化传统中国，作为其对比，他强调的是革命后政治情况的负面，以煽起人们的危机感。按文字表面去理解康有为等人的言说，反而会导致对他们的“文明感”理解有误。

要之，康有为的“‘文明’的解体”论，其目的是要从思想上支持现实的袁世凯政权，是想到推进袁世凯所体现的中国近代化路线的作用。这表明康有为并不是为了从论理上原理性地否定近代性而抬出孔教的。康有为为了推进康有为式的中国近代化，而主张推行重建儒学的孔教，这是他自戊戌变法以前就有的一贯的基本立场（横山英 [1968b]）。

- (20) 横山英 [1968b] 140页。

- (21) 高一涵：《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1日，1页。
- (22) 前掲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1页。
- (23) 前掲高一涵：《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1页。
- (24) 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1卷4号，1914年11月10日，2页。
- (25) 横山宏章 [1983] 认为，陈独秀的这种立场是“极端偏重于知识性”的，只要采取这种立场，“面向社会变革的有力的大众动员就是不可能的”（94页）。但对于当时尚未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成为共产党领导者的陈独秀来说，把受政客等动员而缺乏主体性的民众，锻炼成为“国民”，却是首要课题。
- 确实，笔者也不是要轻视为追求民众的更好生活而斗争的意义。但是，笔者认为，对国民的陶冶来说，不仅要通过教育和大众传媒进行的启蒙活动，也有必要通过地方自治等多种形式而获得参与政治的经验。接受动员而湧上街头，或者手持武器而歼灭敌人，将之作为培养“国民”（有自律性的且为独立的民主主义承担者）的方策，并非先天性的最佳选择。
- 至少，笔者不敢苟同横山宏章从动员群众的效率来评价当时陈独秀的固有课题。过度强调这一视点，与其说是为了“社会变革”，毋宁说是为了有助于打倒政治敌人。据此问题意识，笔者曾对想要通过和平手段而提高人民的认识水平、寻求“国民”形成之契机的罗隆基、施复亮等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进行过研讨（参看参考文献）。
- (26) 朱志敏 [1996] 144, 138页。

参考文献

【日文】

- 佐藤慎一（1996）『近代中国の知識人と文明』東京大学出版会，東京
- 野村浩一（1990）『近代中国の思想世界』岩波書店，東京
- 藤井省三（1994）「恋する胡適」新田義弘ほか編『20世紀知識社会の構図』（岩波講座 現代思想 第2卷）岩波書店，東京，1994年
- 水羽信男（1995a）『『満洲事変』前夜（1928～1931年）における羅隆基の『国民』像』『史学研究』208号，広島
- （1995b）「近年の米国を中心とする中国現代知識人の思想史研究に関する覚書」『広島大学文学部紀要』55巻，広島
- （1996）「羅隆基にみる中国近代知識人像」池田誠・上原一慶・安井三吉編『中国近代化の歴史と展望』，法律文化社，京都
- （2001a）「中国のリベラリズム」『アジア社会文化研究』2号，広島
- （2001b）「ある中国共産党員と大正期の東京」曾田三郎編『近代中国と日本』御茶の水書房，東京
- （2001c）「上海のマスメディア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姫田光義編『戦後中国国民政府史の研究』中央大学出版部，東京

- (2004)「昆明における抗戦とリベラリズム」石島紀之・久保亨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 東京
- 横山 英 (1964)「中国史における変革期のみかた [近代]」『講座社会科学教育・世界史Ⅲ』柳原書店, 京都
- (1966)「清末の変革における指導と同盟」『史学研究』97号, 広島
- (1968a)『孫文』(中山義弘と共著)清水書院, 東京
- (1968b)「五四文化運動前夜の復古的イデオロギー」『広島大学文学部紀要』28巻1号, 広島
- (1971)「辛亥ブルジョア革命説の系譜」(上・下)『史学研究』111・112号, 広島
- (1977)『辛亥革命研究序説』新歴史研究会, 広島
- (1982)「『中国革命同盟会』か『中国同盟会』か」『中国研究』140号, 東京
- 横山宏章 (1983)『陳独秀』朝日新聞社, 東京

【中文】

- 郝斌・欧阳哲生 (2001)《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紀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
- 金观涛・刘青峰 (1999a)《新文化运动与常识性变迁》,《二十一世紀》52期, 香港
- (1999b)《《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二十一世紀》56期, 香港
- 许纪霖 (1999)《许纪霖自选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 朱志敏 (1996)《五四民主观念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

【付記】

本稿は筆者を代表者とする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2)「近代中国における都市と権力——マス・メディアの形成との関連から」の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なお翻訳には劉世龍, 丸田孝志両氏の支援を得た。

The Arguments for "*Xinhai Geming*" (the 1911 Revolution) in the Magazine "*Xin Qingnian*" (*the New Youth*)

Nobuo MIZUHA

The 1911 revolution overthrew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in 1912.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1915-1921) was very significa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New Youth*" and its writers led this Movement. They deepened the ideology of sovereignty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1. How did the magazine argue regarding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11 to 1919?
2. What did their conclusions mea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emocratic thoughts?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se two points because their political experience influenced the thought of the intellectuals of that time. The author also tries to draw comparison between their arguments,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revolution based on the Sun-centered orthodoxy which has long been advocated by some scholars in China.